

福建省社科联丛书

辞书学概论

林玉山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省社科联丛书

辞书学概论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辞书学概论》

林玉山 主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三明市新市中路70号 邮编: 365001)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印张 343.2千字 4插图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906-1

I·801 定价: 1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本书是辞书学领域内一本开拓创新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辞书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书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以下列论证为依据的。读完本书的全部章节或略事翻阅全书的目录，就会发现它与迄今已经出版的词典学论著有明显的不同。迄今已经出版的词典学论著，虽然并不否定词典学要以一切种类的词典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在实质上几乎都是将词典学视同语文词典学，因而只以语文词典（包括单语语文词典和双语语文词典）为研究内容，回答语文词典在编纂理论、实践和历史方面的问题。它们可以满足语文词典编纂工作者的需要，却无法满足其他类型的辞书编纂工作者的要求。本书则不然。它在名义和实质上都从辞书是一切种类的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这一观点出发，将工具书划分为辞书型工具书（包括一切种类的辞典和百科全书）和非辞书型工具书（包括年鉴、手册等资料性工具书，书目、索引等线索性工具书，年表、年谱、历表等表谱型工具书，地图、文物图录等图录型工具书和机关企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等其他工具书）两大类，认为辞书学应以辞书型工具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同

时又认为在工具书学建立以前，辞书学还应适当地承担起研究非辞书型工具书的任务。它的内容，可以基本上满足一切工具书（包括语文词典）的编纂工作者质疑问难的需要，回答当前我国工具书的编纂实践向工具书编纂的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本书的写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同时也更好地贯彻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无可置疑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从词典学之发展成为辞书学来看，本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在古代，世界各国的辞书型工具书就按解释语词的语词性辞书和阐释事物的百科性辞书两大系统发展。散见于从古到今各种辞书里的前言、凡例、编辑说明等等，都属于辞书学文献之列。至于非辞书型工具书的起源和演进，中外各有千秋，而中国对非辞书型工具书的重视和创造的品种之众多，却比国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辞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究形成于20世纪中期。由于当时在辞书出版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是语文词典，从理论上对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工作者主要甚至全部是语言学家和语文词典编纂家，语文词典以外的其他各种工具书的作者和编辑都很少对自己的编纂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研究，所以这门学科在形成之初被定名为词典学并以语文词典为研究对象，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随着各国工具书事业的发展，百科性辞书的编纂出版已蒸蒸日上。以我国为例，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扫除了工具书编纂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来，1979—1988年10年期间，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单双语语文词典共出版近800种，单双语专科辞典（按学科分卷出版的大型专科辞典每卷以一种计算）共出版近1200种，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分册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每卷或每册以一种计算）共出版近160种，年鉴、手册等非辞书型工具书共出版近700种，从事百科性辞书和

非辞书型工具书编纂工作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从事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人数。他们渴望有一本包括语文词典学在内而不以语文词典学为限的辞书学概论出版，帮助他们获得有关工具书编纂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入门，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时参考。我国辞书学研究工作者中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人，充分认识到这种新的情况、新的趋势，因此主张除继续加强语文词典的研究外，还要努力使词典学发展成为辞书学这一学科群，帮助它建立学科体系，包括辞书学概论、语文词典学、百科全书学、专科词典学、双语词典学、年鉴学等分支。其中又以辞书学概论为辞书学体系的“主心骨”，它是辞书学各个专门分支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和各种工具书编纂主要历史的概括，它对辞书学的专门分支有指导作用。国外词典学界原来一直是将词典学等同于语文词典学这一观点奉为金科玉律的，但是从本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也已出现将词典学分为狭义词典学（德文 Sprachlexicographie，即语文词典学）和广义词典学（德文 Lexicographie，包括元词典学〔德文 Metalexicographie，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理论词典学〕、狭义词典学和百科性词典编纂学〔德文 Sachlexicographie，按字面翻译为事物词典学〕）^①的提法，改变了过去认为百科性词典只是在“按词”排列这一点上类似词典而非真正的词典的看法。这从另一方面进一步证明本书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因为它来自实践，结合实践，指导实践，符合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历史前进方向。

本书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是指它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辞书学研究工作者在开辟辞书学研究道路后取得的经验，用专著的形式作了充实、汇总和发展，使之更系统化、条理

^①详见潘再平译《〈词典学国际手册〉大纲》，《外国语》杂志1987年第2期。

化，因而进一步上升为理性认识。毋庸讳言，我国的辞书学研究起步比国外的词典学研究为晚。它的生机勃勃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前提，而以1979年《辞书研究》杂志的创刊为发轫的标志。《辞书研究》的办刊方针，在决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辞书研究遗产和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词典学研究的长处的同时，还决定按照新中国辞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开辟一条辞书学应以研究辞书型工具书为主、适当兼顾非辞书型工具书研究的新道路。10年的实践证明，《辞书研究》之所以能站住脚跟，并且路子愈走愈宽，同这条新道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倘若墨守成规，把辞书学等同于语文词典学来进行研究，《辞书研究》恐怕无法维持到今天，影响也一定远比现在为小。本书的写作，是10年来沿着这条新道路前进所取得的经验的总结，并为今后沿着这条新道路继续不断地向前开拓奠定了基石。类似本书性质的辞书学或词典学论著，国内外都尚未产生，本书应该说是同类作品中的第一本。它揭开了辞书学研究的新的一页，将以新的成就载入史册，所以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书由福建省辞书学会组织编写，林玉山同志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当前图书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倘若单纯从经济效益着眼，本书肯定将无法面世。本书的写作和刊行，充分体现了编写者和出版者坚持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第一的社会主义出版方向，表明他们既富有远见卓识、宏伟胆魄的战略眼光，又富有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的实干精神。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本来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事业，但是在利润挂帅的冲击下，当前我国有不少工具书特别是辞书，质量日趋下降。究其原因，除了把工具书当做摇钱树，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以外，缺乏辞书学的理论

指导，编纂工作者不知自己面前的这部工具书应该如何编纂，未始不是重要因素之一。本书的出版，无疑地将为有心编好工具书而苦于无从入手的编纂工作者指点入门的途径，从而有助于工具书质量的提高。

本书的优点是国内外第一本成书问世的辞书学专著。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伴随着这一优点，也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妥帖、不够缜密之处。例如，将非辞书型工具书称作“广义辞书”，与其收中华书局的《中国教育辞典》，不如收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大辞书》；漏收《格林兄弟德语词典》，法国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辞典》等。但这些缺点纯属小疵，是不能苛求于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的。相信随着本书的修订再版，一定会得到补正，使它精益求精，日趋完善。

杨 祖 希

1990年8月于上海

序

人们通常把收词立目并提供一定的释文内容而按一定的查检法编排的工具书称为“词典”。词典既然是一种工具，那么，工具可以是多用的，却不可能是万用的；因此必然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词典，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回答不同领域和不同的广度或深度的问题。汉语词典的编排，一般都用汉字作为“字头”以带领复词和成语，因此社会上也有人把“字典”和语文词典都叫做“字典”。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作为总结知识、解疑释难、进行社会教育的各种类型的词典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突飞猛进，数量空前；于是近年以来，人们又把包括百科全书在内的各式各样的词典统称为“辞书”。

辞书的功用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常政《百科全书三题》引G·萨尔顿的话：“聪明的人经常查阅百科全书，自满的人轻藐忽视百科全书，愚蠢的人过分依赖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0年4辑）这话实际上适用于一切辞书。记得胡适曾做过一首广告诗：“劝君多卖两亩田，少抽几根烟，劝君买本好字典，随你到天边……”这就是说，好的字典（词典）是人们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水平的必不可无的工具，人人都有随身置备之必要。

当然，任何一种辞书，作为一种工具，其功用价值不能不决定于它的质量，即胡适所说的“好字典”。又因为任何一种辞书，都是编纂人员在收词原则与编写体制制约下的精神劳动的成果，其质量也就不能不决定于辞书工作者对辞书编纂的指导原则的认识，对编纂工作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比如，众所周知，语词意义的解释是语文词典编纂人员应该关注的一个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编纂人员的不同认识必然影响于词目释义的面貌。这是因为词典中的语词义项，不是以自然形态的形式存在着的，而是编纂人员以其言语活动的实践为前提，对言语材料进行分析综合而反映在认识上，并且用语言表述出来的。语词意义的分项表述既然是编纂人员头脑中对言语作品的认识和反映的结果，那么，当然就存在着全面和片面、深刻和肤浅、正确和错误诸问题了。这就是说，阅读资料卡片并且查核原著的编纂人员和定稿人员，其阅读古今著作的理解能力以及所具备的各种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条目释文的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理，辞书是人编写出来的，而且总是要作用于人，即帮助人们对客观事物作正确的了解，帮助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正确交流思想以达到互相了解，这是因为语词与客观事物及其概念是相依为命的、不可分离的。当然，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辞书的编纂人员却是有阶级性的，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于是难免要在立目、释义和书证的引用诸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阶级以及个人的观点方法、思想情操表现出来。这是作为精神产品的辞书的共性；虽然不同类型的辞书应该有其不同的特性。不过在这里应当指出，我国的辞书编纂工作无疑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却不能因此而脱离语言的正确使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辞书编纂规定了错误的政治使命。例如那时有人修改《新华字典》，把“贵”的释义改为“旧社会指地位高，

骑在人民头上”。把“贱”的释义改为“旧时指被压迫剥削，地位卑下”。完全脱离了语言的正确使用。他们提出要使每一个词条的释文都是射向资产阶级的一发发炮弹。其实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辞书中所收的语词，按交际功能来说，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的。辞书的政治思想性只能在少数表示阶级意识的语词或不同阶级有不同理解的特殊含义中，个别地、局部地出现，而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词条”。把语言这种思维和表达的工具视为思想内容的本身，错误地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在辞书领域中的表现。

由此可见，关于辞书编纂的共同原则的探讨，关于各类辞书的总体结构和包括释文在内的条目结构等编纂方法的探讨，对于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从而提高辞书编纂的质量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的辞书——字书、韵书、训诂书、类书、政书以及字典、词典的编纂，源远流长，成果丰富。自《尔雅》、《说文》到《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辞书编纂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论，是经过历史考验过的。林玉山等同志编著的这部《辞书学概论》，能够认真地在继承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总结现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数百部各种类型的辞书编纂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辞书学理论的一些有益意见，并参考已出版的同类著作和论文，全面深入地阐述辞书的性质、结构、编纂法、编纂史以及辞书学研究的内容和任务等课题，材料丰富，论点平实。看来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促进我国“辞书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从理论高度上指导各种辞书的编纂实践，无疑将会发生一定的作用。

我是汉语教学和科研人员，同时也是语文词典的编纂人员，依我的体会，辞书学的理论知识，不但是辞书编纂人员所需要，而且也是选择和使用辞书的读者所需要的。因此，当我得知这部

《辞书学概论》将要问世的喜讯时，感到格外高兴；于是执笔做《序》，用申祝贺之意。

洪 笃 仁

1990年国庆节

于厦门大学凌峰楼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的欣欣向荣的辞书编纂事业呼唤着辞书学，近10多年来的辞书研究的繁荣也孕育着辞书学。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我们决心在辞书学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播种，以祈求新的收获。

收获终于有了，在我们面前，摆着33万余言的《辞书学概论》。

辞书学是新兴学科，人们对它的研究越来越兴趣、越广泛、越深入了。福建省辞书学会也把对辞书学的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决心把研究的成果，编纂成《辞书学概论》。学会研究由我主持此项工作并担任《辞书学概论》主编。我在福建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工作多年，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辞书，为工作需要，也研究辞书学，深感到需要对辞书编纂的实际工作加以总结，使之升华为理论，以进一步充实、完善辞书学，更好地指导辞书编纂。在继承国内外辞书研究成果和总结辞书编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编写了《辞书学概论》目录大纲，并写信征求复旦大学教授陈炳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韩敬体，《辞书研究》编辑徐祖友等先生对目录大纲的意见。他们都是很有造诣的辞书学家，对目录大纲提了许多很中肯的意

见；又经《辞书学概论》正副主编的讨论，对目录大纲作了部分修改后将目录大纲分给编者进行编写。1990年7月中旬，福建省辞书学会召开辞书学研讨会，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上海市辞书学会副会长严庆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金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辞书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学林，《辞书研究》编辑王秀等先生和40多位福建省辞书学会会员和辞书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对《辞书学概论》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正副主编对各个编者写的初稿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各位编者根据研讨会代表和正副主编提出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承蒙辞书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杨祖希先生，语言学家、《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厦门大学教授洪笃仁先生在百忙中审阅书稿，并予以肯定的评价提了很中肯的意见，均为本书各作了序。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海峡文艺出版社请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辞书学家王自强审读了本书稿。王先生审读异常认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对这本尚欠成熟的著作亦大加奖掖，“本稿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辞书学的形成和发展，既继承了我国辞书编纂史的传统，又总结了当代辞书编纂的经验，同时还注意借鉴国外辞书理论的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见解，内容较已出版的《词典学概论》、《辞书概要》、《词典论》、《辞书学研究》等著作更为丰富充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理论著作的不足。本稿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有些见解虽是一家之言，但对推动我国辞书学的研究和指导我国辞书编纂工作实践，必将起重要作用。本书的出版，也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稿论述全面，内容丰富，应是一部有影响的力作。”我们对王先生的勉励深表感谢。无疑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支持，为此我们也表示由衷感激和谢忱。

著名的辞书学家陈炳远教授看了这本书目录大纲和 部分 章

节书稿，但却看不到这本书的出版。他是在病榻上看了这本书稿和目录大纲的。这种忘我精神令人无限敬佩。他给我的信说：“《辞书学概论》读后很高兴。我觉得这是发展学术的正确的、勇敢的决定。辞书编纂的实践需要这样的书，广大读者需要增进这样的新知，辞书工作者也需要手头有一部供参考的书，辞书教学工作者，肯定离不开这样的书。目前这类书出得很少，出不来，实在是不正常的。”可喜的是，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吕良弼、林其华先生和学会部的主任王爱琪同志对本书的写作也非常关心，并热情地给予支持和指导。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林秀平、施群、吴珊珊等先生也积极支持对本书的出版，并给予热情的指导。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这也许可以告慰陈老在天之灵了。

本书在编写中，还广泛参考了已发表的辞书学论著（详见附录参考书目），吸收了和采用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资料，除重要的注明出处外，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标出，敬请有关作者谅解。

《辞书学概论》不仅是编著者心血的结晶，也是福建省辞书学会全体会员和全国辞书编纂、出版、研究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当然也凝聚着责任编辑吴珊珊等先生的心血。他们的宝贵意见和精心润色地修改，大大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本书第一章由林玉山、陈庆武编写，第二、三章由林玉山编写，第四章由杨树增、董金环编写，第五章第一节由薛剑秋同志编写，第二节由黄今许同志编写，第三、四节由周长楫同志编写，第五节由吴建平同志编写，第六节由林玉山同志编写，第六章由黄高宪、李青、林大础、周长楫、吴建平、陈庆武、林玉山同志编写，第七章由吴建平同志编写。附录由林玉山、李青编写。陈皓、戴本金、张一建、林齐民等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书稿由各位著者修改定稿之后，第一、二、三章由林玉山、陈庆武增删修改，第四、五章由黄今许增删修改，第六、七章由

周长楫同志增删修改，全书由林玉山同志总纂、定稿。书稿1990年10月交出版社后，林玉山又根据出版社意见，作了三次修改。陈庆武、周长楫、黄今许协助主编作了许多工作。薛剑秋、吴建平、林大础、黄高宪等查核了一些资料和外文。

编纂《辞书学概论》还是一种尝试，没有现成的书可供参考，辞书学又是新兴学科，更限于主编水平，书中论述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教，俟再版时修订完善。

正当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曾帮助过此书的辞书界老前辈陈炳超、洪笃仁、刘学林、杨祖希先生却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辞世，我感到极度的悲伤，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作为永久的悼念。本书出版时，想他们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林玉山

1990年10月一稿

1993年12月二稿

1994年6月三稿

1996年四稿

于温州知微斋

目 录

杨祖希 编审序	(1)
洪笃仁 教授序	(6)
前言	(1)
第一章 辞书和辞书学	(1)
第一节 什么是辞书	(1)
一 辞书与词书、词典、辞典、字典	(1)
二 辞书的定义	(3)
三 辞书的功用	(5)
第二节 什么是辞书学	(8)
一 辞书学的定义	(8)
二 狭义辞书学和广义辞书学	(11)
三 辞书学与语言学	(12)
四 辞书学与社会意识形态	(15)
第三节 辞书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18)
一 辞书的一般理论的研究	(19)
二 辞书类型的研究	(19)
三 辞书编纂原则和方法的研究	(19)